怀揣敬意，重现立国之战始末

国庆档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首发“初心”特辑

■本报记者 王彦

国庆档蓄势待发，备受瞩目的陈凯歌导演作品《志愿军：雄兵出击》将于9月28日上映。正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所说：“时代在变，精神永存，抗美援朝题材值得永恒书写。”

今天，该片将首发“初心”特辑。《志愿军》三部曲的拍摄初衷与历程为何？作为系列开篇之作，《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叙事重点是什么？“初心”特辑通过片中两场重头戏的幕后故事，将为观众拉直问号。据片方介绍，系列第一部从决策出兵起笔，涵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这一阶段的历程。主创希望，能将观众拉回70多年前，重温那场为正义出征、为和平而战、为人民冲锋的战争的意义，重温中国军民共同守护的宝贵信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同时，由伍修权率领的外交队伍在联合国与美国进行了另一场短兵相接。

▶《志愿军》三部曲共上万张设计稿和概念图，以呈现不同的战地环境。 制图：李洁

敬历史，大银幕再现新中国首次亮相联合国的尊严时刻

与以往抗美援朝题材影片不同，《志愿军》三部曲着力以全景式、多维度方式展现立国之战。三部曲整体的故事时间跨度达三年，完整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脉络。片中出场人物超200个，既有领袖将帅，也有无名英雄，个体命运和时代风云交互激荡，力争为观众展开一卷磅礴的战争群像。

顺着时间轴，三部曲第一部围绕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展开，负责在松骨峰阻击敌军的38军戴如义（魏晨饰）、杨少成（尹昉饰）、孙醒（陈飞宇饰）等角色将在这一部登场。历史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同时，由伍修权率领的外交队伍在联合国与美国进行了另一场短兵相接。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大银幕将再现新中国外交代表团首次亮相联合国的历史性时刻。随战事发展，第二部会添加新角色，如63军李想（朱一龙饰）、傅崇碧（吴京饰）、蔡长元（韩东君饰）等。第三部的时间线始于和平谈判，边打边谈，上甘岭战役、板门店停战谈判等内容将在此终章重点呈现。

三年的故事跨度，对应现实中399天的拍摄期。对陈凯歌，这是他个人从影以来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想把它拍好，致敬历史”。营造历史真实感成为拍摄过程中最费思量的工作。从人物造型到场景，有史料可依的部分，剧组都力求还原，重中之重当为新中国外交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初亮相。1950年，中国政府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率代表团赴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总部第一次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为再现新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是代表着国家尊严的历史性时刻，主创以史料为据，搭建了1:1还原的联合国场景。饰演唐笙的章子怡感慨，沉浸式场景能帮助演员“感受到73年前那个庄严时刻”。演员的形象、动作也被要求对标当年影像。张颂文饰演伍修权，重点落在举手投足既要有“将军外交官”的果敢和威严，也需要彰显新中国的决心和力量。美术指导陆苇说，拍联合国会议，真实是首要准则，“那个瞬间，中国人民等得太久了”。

敬英雄，“松骨峰”上栽松树致敬“最可爱的人”不屈意志

松骨峰阻击战的一幕幕被作家魏巍写进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传遍祖国大地。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奉命在松骨峰阻击南逃的美军。面对敌人的飞机坦克，3连官兵以百人之力拼死阻击，子弹打光了就端起刺刀冲向敌人，被燃烧弹打中就跃出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全连官兵浴血奋战，最后仅剩7人，牢牢守住阵地，为我军主力部队聚歼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一战，3连付出重大牺牲的代价，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凭此打出威名、震慑美军。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松骨峰一役也是全片重头戏。为重现世所罕见的惨烈战役，演员们穿梭于“枪林弹雨”，与炸点木屑近距离接触。升级的技术也为战争戏加成，为距离英雄的勇敢坚毅近些再近些，摄影师吊着威亚运镜，尝试了镜头调度复杂的空中拍摄。

在陈凯歌看来，美术置景、服化道、拍摄技术，固然是重要手段，但人的精神面貌对于拍好战争戏至关重要。他提出要在片场的“松骨峰”栽一棵真实的松树，“松树在我们的文化内涵中是勇敢与坚贞的象征”，这与志愿军战士乃至所有中国人的气节是一致的。他相信，这棵松树还能使“松骨峰”具有影像上的象征意味，凸显战役的悲壮。于是，剧组当真栽下一棵松树，让它与“战士们”同历战火。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创作者们希望，他们怀揣敬意的作品能为观众重现立国之战始末——抗美援朝战争，无数中华儿女交付青春甚至生命，他们奋不顾身、以命相搏，换来新中国长久的和平与发展，历史需要铭记。而在70多年后的今天，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依旧能给予年轻人莫大力量。

整容式改编“侦探女王”阿加莎小说

《威尼斯惊魂夜》：一场虚张声势的闹剧

■本报记者 柳青

《威尼斯惊魂夜》由小说《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改编而来。

《威尼斯惊魂夜》让人眷恋的部分是它的结尾，和剧情无关，空镜头里拂晓的威尼斯太美，朝阳洒落公爵府的画面流露着壮丽的美感，它独立于小说和电影之外。威尼斯这座城市有着凌驾于时光的吸引力和蛊惑力，发生在威尼斯的爱与死，没有年代感和时间感——导演肯尼斯·布拉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挥霍无度地浪费了威尼斯这个自成一体的特殊角色。其实，他也浪费了“侦探女王”阿加莎的创意和一群尽职尽责的演员们，由小说《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改编而来的《威尼斯惊魂夜》，成了一场虚张声势的万圣节闹剧，极尽浮夸，极尽过火。

“陌生化”的波洛破案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被认为是阿加莎小说里“不够出色”的一部，未必是阿加莎在写作中失了水准，确切说，这个故事打破了读者的期待和惯性思维，它类似于让侦探波洛走串了片场，穿越到马普尔小姐的故事里。小说情节发生在伦敦周边的新兴小村镇，小镇是个带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常态又倾向半封闭的熟人社会，通常在阿加莎的笔下，这类“小镇疑云”的环境是马普尔小姐发挥本事的地方。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对熟知波洛故事的读者而言是种“陌生化”的体验，对波洛本人也构成一段“陌生化”的破案经历。波洛出场前，谋杀案就发生了，一个被认为撒谎成性的少女离奇地死在万圣节前夜的派对里。波洛受了好朋友、悬疑小说作家奥利维耶的邀请，从伦敦赶到镇上，这个低调、和蔼的小老头，不动声色地潜入“每个人认识每个人”的小世界，他从看似毫不相关的细节里摸索到真相惊人的“全景”。

这个故事里有诸多熟悉的阿加莎元素，比如，连环套的悲剧始于对金钱/遗产的谋算，接二连三地出现被欺骗又被谋害的姑娘。但《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并不是阿加莎重复自己套路的一部“行活”畅销小说，她在熟悉的桥段里写出了对战后英国社会变迁的观察：城镇化发展造成的人口流动，流行文化造成的老辈人和年轻人的代沟，老一代对越来越迫近的外部世界感到不信任，但凡带着不确定因素的人和事都让人们感到恐惧，莫名的“精神不稳定”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症候。阿加莎没有刻意地在叙事中强化社会议题感，她的笔触是克制的、又是轻盈的，给人错觉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写了些小镇轶事。

低姿态的小说vs大尺度的电影

原作中，没有任何惊骇的内容发生在明面上，哪怕是波洛确认凶手的身份并察觉他将要对新的受害者下手时，那仍然是花园闲谈的平和场景，凶手不响，波洛更不响。阿加莎的写作特色是维持低微的姿态，人物的行动和感受都是微妙的，不易察觉的。这个故事里波洛唯一表露出他的“感受”，是他坚持穿正装皮鞋走了太多的乡间小路，以至于双脚剧痛，而脚痛这事又是不可见且不足为外人道。

布拉纳显然不满足于阿加莎原作的“清淡”，他要突出传奇感，渲染跌宕的戏剧性，于是用华丽的威尼斯替代了伦敦近郊的无名小镇。确切说，布拉纳改编的阿加莎系列——《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这部《威尼斯惊魂夜》，这些电影何止“不响”，简直“太响”。

《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布拉纳尚且没有大张旗鼓地确立“个人风格”，《尼罗河上的惨案》辨识度就很明显了，尼罗河两岸的景观是放大的，痴男怨女之间的情欲也是放大的，布拉纳在电影里制造的尺度，无论是情感还是感官，都是放大的，他用直白的冲击力消灭了作家的含蓄。《威尼斯惊魂夜》明确地把暗流涌动的“言谈交锋”，变成一惊一乍的恐怖片，被暗算后喝下致幻毒药的波洛，带着观众在威尼斯的老宅里经历了一趟“午夜鬼屋”。一场夜雨让威尼斯的运河掀起巨浪，暴风雨中的贡多拉把雕栏玉砌的老宅撞得摇摇欲坠，这场景令人十分出戏。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整容式改编彻底改变了角色的背景和性情，以至于观众不得不在电影和小说之间玩“角色连连看”的游戏。《威尼斯惊魂夜》步子跨得更大，布拉纳挪用了小说的部分情节和部分角色的名字，做了重新排列组合的工程，写一个和原作毫无关系的故事。这大致相当于把《红楼梦》改写成“霸道总裁贾宝玉爱上落难少女林黛玉”。

被叛变的阿加莎

接连三部“阿加莎新编”电影，布拉纳作为导演，拍出了具有清晰辨识度的个人风格，代价是把阿加莎的小说当提款机，或者，原作沦为被涂脂抹粉、胡乱打扮的洋娃娃。一目了然的作品气质差异，所涉及的不仅是审美趣味的南辕北辙，更深层的是作者的立场之差。

阿加莎的小说里，弥漫着女性本位的哀矜。《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里有一抹痛苦的底色，关于一个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绝望地爱着自己的生父，父亲在明知女孩身份之后仍诱拐她、利用她，甚至决定杀女儿灭口，他不动声色地给女儿画像，给画中少女署名伊菲格涅亚——那是希腊传说中惨死在父亲手里的女儿，阿伽门农杀她祭神，为了换取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布拉纳对阿加莎最彻底的叛变在于，他把不择手段的父亲改成有着恐怖控制欲的母亲，步步为营，把成年的女儿变成“长不大的小姑娘”拴住，最终悲剧性地意外杀死了女儿。

阿加莎写死于非命的妻子们，写被蒙蔽的女儿们，她反复地写着机关算尽的男人以看不见的方式置女性于绝路，波洛或马普尔都是尽他们所能地帮助女性绝处逢生。布拉纳的“故事新编”彻底地颠覆了这点，波洛是受困于衰老和心魔的男人，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各式各样受难的男人、委屈的男人，而女人是狡猾的女作家，或招摇撞骗的女骗子，或可怕的老母亲，她们要么死了，要么不配被救赎。这一点，大概真是要把阿加莎气得掀棺材板。

『看似平易但难以把握』，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解读汪曾祺

经典文学作品何以长红？

■本报记者 许旸

提起作家汪曾祺，不少读者眼前会展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画卷，淡淡笔墨勾勒出随和可爱老头形象。相较同时代作家，汪曾祺似乎总能从平淡生活中找到乐趣，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日常美学。多年来《汪曾祺全集》《觅我游踪：汪曾祺记游》《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等持续长销，《受戒》等小说推出新版，他的作品持续“圈粉”密码究竟是什么？

“汪曾祺呈现出来的风格比较晓畅、平易，给人感觉这个作家似乎很容易把握，但其实我们都错了。梳理汪先生的创作，我仿佛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近日，“名家读经典”系列活动上，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以《受戒》为例，探讨40多年前创作的短篇小说为何依然经得起重读咀嚼。

不刻意传奇化，如实贴着生活写

他的美食散文，为故乡高邮的咸鸭蛋成功“带货”；他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等，是评论界反复研究的经典母本……

“篇幅不长，读起来轻松，呈现了一种美好、放松的状态，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极少，所以一写出来就备受关注。”在徐则臣看来，汪曾祺的《受戒》追求的正是呈现生活本身的状态。他不喜欢编故事，也不追求在小说中营造一种非常机巧、奇绝、刁钻的结构，但恰恰这种风行水上、随处成文、非常自然的风格，成为散文化写作的一个典范。

汪曾祺生前曾打过比方，小说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在他的笔下，人情世故是诗意、恬淡的，无论喜乐悲欢，是否阴晴圆缺，人们都挚爱着生活，也拥抱着风俗，在风俗中逗趣，于生活中洒脱。徐则臣感慨，《受戒》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汪曾祺没有把小说刻意拔高，也没有过度传奇化，也不会把小说变成生活的对立面、对手或敌人，就是如实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觉，还原生活、体贴生活、认同生活。

从行文到语言乃至整个叙述方式，汪曾祺更多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鲜少起伏奇崛、戏剧化、有冲突的故事，但这样的小说却吸引了许多忠实读者，靠什么？徐则臣认为，靠的是韵味，是作品背后作家人格的力量，靠的是语言的修为。

如果说生活总要有点乐子，汪曾祺善于不疾不徐地将读者带到色声香味、鸟兽虫鱼的世界，并怀着挚爱亲切感，去发掘蕴藏在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也就不难理解，汪曾祺会写下这样的感悟：“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融合传统与现代，形成新的民族叙事

身处全球化时代，有一种声音认为，文学故事里处理的经验似乎越来越同质化。如何跳出单一的标签，令文学笔法更具辨识度，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

徐则臣从汪曾祺作品中获得的启示是，民族传统对当下写作的重要性。“回到民族传统，同时不拒绝国外文学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但是不拒绝现代主义。把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外的文化融合起来，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

运河滔滔，文脉悠悠。徐则臣和汪曾祺小时候都生活在大运河边上，作品人物身上都有水的柔软与坚韧。“我在写运河时常重读汪先生的作品，寻找那个水汽氤氲、波涛浩渺、蒹葭苍苍的，还有人情冷暖的感觉。我从中获得许多共鸣。你能感觉到他小说里满溢的烟火气。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他是非常理解、包容的，就是要和谐地呈现出生活本身。”也恰恰是在这种自然流淌的记录中，汪氏笔法形成了新的民族叙事。

学界也关注到汪曾祺独有的“融合性”——“汪曾祺有烟火气，他能够把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冷暖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学者孙郁研究后发现，有时候能够感受到汪曾祺跟柳宗元、苏轼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段，有时候能读到他跟张岱、袁宏道、袁宗道这些人内心相通的句子。“汪先生对传统把握得确确实实很有味道。但是他又有现代性，他并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里，他有现代精神。”

张宪光在《汪曾祺：人间知味者》里评价，汪曾祺的散文并非一味平淡，不问是非，“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慷慨激昂罢了”，他对风景与物性之美的描写，对平民悲欢、文士喜乐的书写，本身即是爱憎的体现。“他的行文风格是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的两个传统孕育出的最美果实之一。”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